

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

——以《受戒》为例

黄道吉

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

摘要：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沈从文、废名为代表的“京派小说”，《受戒》在1980年发表，有着其独特的意义。本文以《受戒》为例，从健康人性的书写、乡土风俗画的展现、散文化的结构、口语的活泼与古典的优雅几个角度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。

关键词：《受戒》；汪曾祺；艺术特色

【DOI】10.12255/j.issn.1672-6677.2020.05.572

《受戒》是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。1980年，文革刚刚结束，在整个社会反思语境的背景下，所有作家都在批判、反思那场浩劫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蔚然成风。汪曾祺的《受戒》在1980年横空出世，无论在写作内容还是语言风格上，都同当时的文坛主流格格不入。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用文学去反思政治、批判文革，《受戒》从审美的眼光观察生活，同政治全不相干，它写的是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小和尚。

一、健康人性的书写

《受戒》中，明海之所以出家，是因为出家在当地是一种风俗、一种职业。出家有很多好处，可以攒钱，吃现成饭，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。明海出家的地方叫菩提庵，当地人以讹传讹叫做荸荠庵。荸荠庵处在一个三面环水的小岛上，说明环境相对比较隔绝，不受外界太大影响。荸荠庵和尚的生活乍一看颇让人吃惊：二师父在庙里有老婆；他们打牌赌博，三师父仁渡的牌技特高；庵里有田产租给别人，还收租放债；和尚本不应杀生，他们过年时毫无顾忌地在殿堂上杀猪；每做一次法事，总有大姑娘小媳妇跟和尚跑了。题目为“受戒”，实际上写的是破戒。汪曾祺之所以这样写，是为了展现一种本真的、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的健康的人生状态。汪曾祺说：“我写《受戒》，主要想说明人是不是受压抑的，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，肯定人的价值，我写了人性的解放。”明海在荸荠庵，认识了邻居小英子。小英子家的生活环境如同世外桃源一般：家里种着茨菇、荸荠，赵大伯田里场上样样精通，赵大娘善剪花样子，腌的咸萝卜干特别好吃，两个女儿大英子文静小英子活泼。

在《受戒》中，没有政治的纷争，没有生活的艰辛，没有悲凉，没有伤感，一切都是那样和谐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。表面上，小说的主人公好像是明海和英子，其实作者只是借人物来一种桃花源式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理想。在这样一种桃花源中，人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，情感是淳朴的、健康、美好的。

二、乡土风俗画的展现

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中公认的风俗画大家，其《端午的鸭蛋》《胡同文化》等都是关于风俗的散文名篇。在小说中，汪曾祺也常常穿插不少风俗画描写。《受戒》中，“县城真热闹：官盐店，税务局，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，一个驴子在磨芝麻，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，布店，卖茉莉粉、梳头油的什么斋，卖绒花的，卖丝线的，打把式卖膏药的，吹糖人的，耍蛇的……”这些描写充满着民俗色彩。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不太可靠的评价标准，即是以生活气息是否浓厚来作为作品质量高下的评价标准之一。如沈从文写湘西、老舍写北京、赵树理写晋东南、路遥写黄土高原等，都充满着浓厚的地域色彩。汪曾祺也非常重视风俗的描写，他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风土民情以及人情之美，极富于地方特色。

三、散文化的结构

不论是《受戒》还是《大淖记事》，汪曾祺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散文化的特点。传统小说往往以情节取胜，情节越曲折，越吸引人，但是汪曾祺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，反而有意淡化故事情节。汪曾祺说：“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：散。这倒是有意为之。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，主张信马由缰，为文无法。”《受戒》情节很简单，甚至几乎没有情节。作品名字是“受戒”，可是作品将近结尾时才用简略的笔墨交代了主人公明海的受戒，文章前面较长的篇幅在同读者闲谈当地的风俗、荸荠庵里和尚们的生活、小英子一家人的日常生活。这些随意穿插的情节，同故事主线关联不大，但是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和氛围，而且开启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。

四、口语的活泼和古典的优雅

汪曾祺的小说中，采用了非常地道的口语和方言。《受戒》中，如“不把钱。有法事，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。”“不把钱”“尽”都是苏北一带的方言。“不把钱”就是不用给钱的意思，“尽”就是第一个先请。汪曾祺掺杂了不少非常质朴、简洁的地方方言，使人物更为鲜活、活泼。

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、方言中寻找语言素材以外，还非常注重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。他特别喜欢明代归有光的散文，尽管他没有用文言文去写文章，但是古代汉语所孕育的端庄、雅致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他的文字之间。汪曾祺小说将口语的活泼与古典的优雅结合在一起，极大地缩短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距离。

若追本溯源，汪曾祺的小说同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家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。早在20年代，有一类小说流派叫做乡土小说，乡土小说的作家如王鲁彦、台静农、许钦文、蹇先艾等作家侧重于揭露中国农村的冷漠、势利以及种种悲剧，但是在乡土小说作家中废名比较特立独行，同其他侧重于揭露、控诉农村痼疾的作家不同，废名写的是农村清新的景致以及古朴、淳厚的民风。废名的这一创作特点在30年代被沈从文所传承，这在沈从文的代表作《边城》中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废名与沈从文同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。汪曾祺40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教写作课的老师正是沈从文。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京派小说的创作特点，他的作品同沈从文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无论是在《边城》还是《受戒》中，都有意拉开与现实政治的距离，呈现出一种“桃花源”式的静美、和谐。两人都很注重风俗描写，他们的小说都不重情节的曲折，小说都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。

汪曾祺的小说，上承京派小说，下启寻根小说。建国以后，十七年文坛普遍关注“宏大主题”“宏大叙事”，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，汪曾祺的小说跳出了这样的藩篱，侧重于关注小人物、小事件、小生活，讴歌人情人性之美，开创出一种新格局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朱栋霖,朱晓进,吴义勤主编.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-2013第三版下册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4.
- [2]汪曾祺.汪曾祺集[M].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4.
- [3]樊尧.浅析散文化小说的文体特征——以《受戒》为例[J].文学评论,2020.
- [4]尹爱华.浅析沈从文和汪曾祺创作的相似点——以《边城》和《受戒》为例[J].晋中学院学报,2012,29(06):96-99.